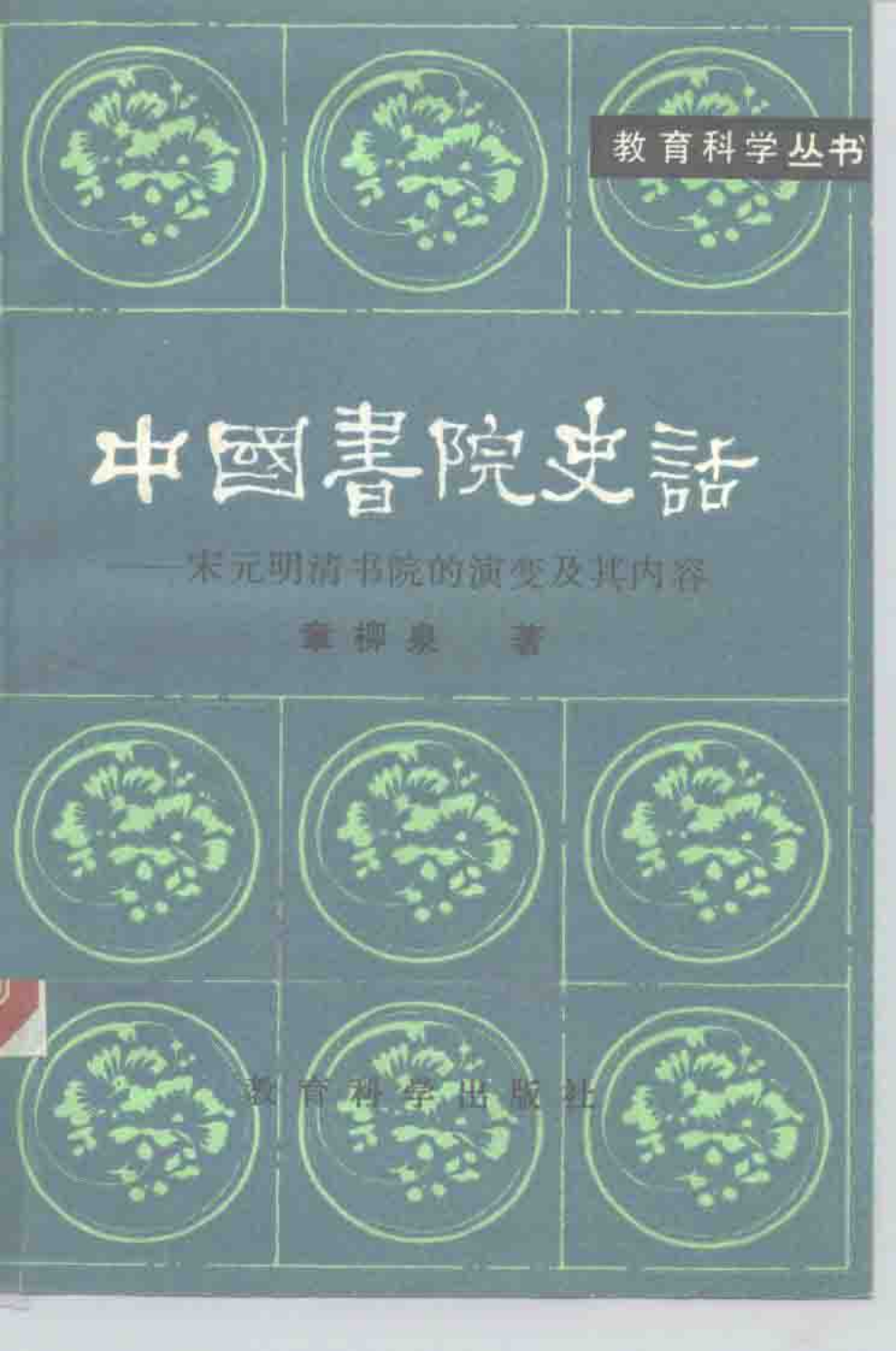




教育科学丛书

中國書院史話

——宋元明清書院的演變及其內容

章柳泉 著

教育科學出版社

教育科学丛书

中国书院史话

——宋元明清书院的演变及其内容——

章柳泉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论述我国书院制度内容、沿革和发展演变的专著，资料丰富，内容充实，立论确当，也比较系统。

宋元明清的书院，在我国教育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我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起过重要作用。

这本书对学习、研究我国教育史和学术思想史的同志，对广大教育工作者都很有参考价值。爱好史学的一般同志，阅读此书，也可以开阔视野，丰富知识，进一步了解我国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

教育科学丛书
中国书院史话
章柳泉 著

*

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顺义燕华营印刷厂印装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 字数 100,000 字
1981年3月第1版 1981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书号: 7232·42 定价: 0.63 元

目 录

一、书院的涵义和特点

书院是私学·····	(4)
书院传习理学·····	(5)
书院受禅林影响·····	(10)
书院祀先贤·····	(13)
书院有藏书·····	(15)
书院择师选生·····	(18)

二、书院的演变

(一) 书院建置的演变

1. 宋代书院的建置·····	(23)
2. 元代书院的建置·····	(27)
3. 明代书院的建置·····	(29)
4. 清代书院的建置·····	(34)

(二) 书院学术传授的思想内容的演变

1. 南宋书院的传授是朱学、陆学、浙学三家 鼎峙的时代·····	(38)
2. 元代书院以传授朱学为主·····	(54)
3. 明代书院大兴陆、王心学的传习·····	(58)
4. 清代书院的特色是崇尚汉学·····	(67)

5. 书院学文的演变·····	(82)
（三）书院学术传授的方式方法的演变	
1. 自学为主·····	(88)
2. 讲学·····	(90)
3. 立课程·····	(94)
4. 兴考课·····	(100)
5. 静坐内省·····	(104)

三、书院的学风

（一）治学精神

1. 刻苦求学, 认真对待学问·····	(109)
2. 注重创发, 提倡求真·····	(116)
3. 坚守所学与兼取诸家之长·····	(122)
4. 扎扎实实掌握基本的学习内容, 勤勤恳恳 积累有用的文献资料·····	(128)

（二）师友讲习

1. 尊师爱生·····	(136)
2. 师友砥砺·····	(152)

一、书院的涵义和特点

书院这个名词，最早见于唐代。唐玄宗开元中置丽正殿书院，十三年（725年）改名集贤殿书院。但这是设于朝省的藏书和修书的机构，与汉代的东观、兰台，清代的文渊诸阁相同，并非士子肄业的地方。唐代也有一些私人读书处称书院，见于唐人诗篇，也不是授徒之所。作为讲学授徒作育人才的书院，始于南唐昇元四年建立的白鹿洞学馆，亦称“庐山国学”。到北宋，有了闻名的四大书院或六大书院，书院便在我国教育事业中占有地位。四大书院的说法不一。王应麟的《玉海》，定为白鹿洞、岳麓、嵩阳、睢阳；马端临的《学校考》，则取石鼓而去嵩阳；《衡阳图志》又取石鼓而去睢阳。还有提茅山书院的。①全祖望曾做过一番考证，主张以《玉海》所定为是，理由是石鼓到宋仁宗时才赐额，不久又改为州学，为书院。

① 白鹿洞书院：唐李渤与兄涉隐居读书于庐山白鹿洞，南唐昇元中，因洞建学馆，置田以给诸生，以李善道为洞主，掌教授，当时称“白鹿洞国庠”。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赐九经。仁宗皇祐五年（1051年）孙奭就故址建学馆十间，榜曰“白鹿洞之书堂”，使弟子能居而学。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为南康守，重建，并订了出名的“白鹿洞书院教条”。岳麓书院：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守朱洞在岳麓山抱黄洞下，造了讲堂、斋序以待四方学者，真宗咸平二年（999年），潭守李允扩大了规模，并有书楼。祥符八年（1015年）赐名岳麓书院，增赐中秘书。南宋孝宗乾道初（1165年）湖广安抚刘珙重建，张栻有《岳麓书院记》。睢阳书院：即应天府书院。祥符二年诏应天府新建书院，以曹

的时间很短。(见《鲋琦亭集外篇》)北宋虽然有了几个出名的书院,但并不发达。书院大盛在南宋。不仅数目大增,而且形成各种的学派。全祖望在同一文中指出,由于金兵南下,嵩阳、睢阳二书院遭到破坏,四大书院只剩下白鹿洞和岳麓。这两个书院因为朱熹和张栻在那里主讲过,声名很大,可是新起的吕祖谦的丽泽书院和陆九渊的象山书院,也与之齐名。他说:“四家之徒遍天下,则又南宋之四大书院也。”这里所说的四家之徒,指的就是学派。自宋以后,历元明清,书院不断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也有一些不良的影响,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2年)才废止。如果从昇元四年(940年)算起,书院的存在,有九百六十余年的历史。

书院的兴起,一般都说是由于五代时学校荒废,而宋初八十年又未兴学,为了适应“士病无所于学”而办起来的。吕祖谦说:“窃尝闻之诸公长者,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间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见《鹿洞书院记》)朱熹说:“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

诚为助教,国初有戚同文者在此授徒,曹诚就戚同文旧居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五百余卷,延生徒讲习。诏赐额为本府书院。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以书院为府学。嵩阳书院:在太室山南,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赐名太室书院,祥符三年赐九经。景祐二年敕西京重修,更名嵩阳书院。石鼓书院:唐宪宗元和间,士人李宽构屋石鼓山颠,读书其中。宋太宗至道间,郡人李士真就遗址重建,景祐间赐额石鼓书院,并赐田。茅山书院:宋仁宗时,侯遗居茅山,营建书院,教授生徒。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赐田。南宋理宗淳祐中,孙子秀知金坛县,访其故址,加以修葺,后为道观占据。

讲习之所。”（见《石鼓书院记》）王应麟的《玉海》，述宋代四大书院的兴起，也是这样讲的。此外还有认为不仅学校废要办书院，学校衰也要办书院，这便是所谓学校书院并存论。王守仁说：“惟我明自国都至于郡邑咸建庙学，群士之秀，专官列职而教育之，其于学校之制可谓详而备矣，而名区胜地，往往复有书院之设，何哉？所以匡翼学校之不逮也。”（见《万松书院记》）明黄泰泉《论书院》也说：“惟夫教导无实，讲学既废，修学奚由，……则夫别设书院，以延名儒淑子弟，又焉可无哉。”黄以周说：“于是洪容斋（迈）谓学校书院并立非盛政，明张太岳（居正）遂令天下书院一切罢毁。揆其意，在振学校而一风教，而学校卒不振。好古之士，无以勤讲贯，资观感，为害滋大。吾谓学校兴，书院自无异教，学校衰，书院所以扶其蔽也，洪张所言，岂通义哉！”（《见傲季杂著·论书院》）黄以周批评过明季以来书院的积弊，但称赞阮元所办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这两所课士之新馆，虽以“精舍”、“堂”命名，实际仍是书院。

书院是怎样的一种教育机构？如果立一个简单的界说，如说“书院是宋、元、明、清高于蒙学程度，不列入国家学制的一种教育机构”，当然可以使人对书院的涵义，得到一个简单的轮廓。又如黄以周在《论书院》中所说的：“沿及南宋，讲学之风丰盛，奉一人以为师，聚徒数百，其师既歿，诸弟子群居不散，讨论绪余，习闻白鹿、石鼓诸名，不复加察，遂遵其学馆为书院。”这也可以说是对南宋的书院作了一个简单的说明。书院的历史很久，历代的演变又极复杂，一个简单的定义，无论如何是不能表达清楚的。要对书院的内容有个具体明白的了

解,应当对书院的一些特点,作一番探索。这些特点是从各个侧面提出来的。应当指出,不是任何一个书院都具备一切的特点,而每一个特点又都具体地表现在历代某些书院中。把这些特点一一加以分析,对书院的全貌,就自然会有一个深切的理解。书院有哪些特点呢?

书院是私学 在官学遭受毁坏,庠序失教的情况下,便有属于私家的乡里之学兴起。程度低的是蒙学,包括义学、学馆、家塾,程度高的便是书院。五代时,魏州人罗绍威,聚书万卷,开学馆,置书楼,以延四方之士。青州人石昂,家有书数千卷,士无远近,多就昂学问。蜀人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板刻《九经》。江州陈氏,五世同居,长幼七百口,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见新旧《五代史》及《湘山野录》)这些都是乡里私学。宋初四大书院或六大书院,也都是民间力量办起来的。私学不始于五代。孔子在春秋时就开创儒家私学。汉代以经术造士,除太学置博士传经外,许多隐居的经术大师,也立精舍或精庐,私人讲学,生徒很多。此风西汉末已盛,东汉则更加发达,据《后汉书·儒林传》所载,像张兴、牟长、蔡玄、楼望等人,著录弟子都近万人或超过万人。南宋书院,奉一人为师,极似汉代私学,而且还用了“精舍”的名称。纪念陆九渊的象山书院,原名“应天山精舍”;纪念朱熹的“考亭书院”原名“沧洲精舍”。这样看来,说书院是私学,不是没有根据的,特别是在宋代。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书院,或者书院自始至终都是私学。实际情况说明,即使在宋代,有些大书院就受到赐额、赐书、赐田的待遇,已经有了官助的因素。到了元代,书院就大受官府的控制。在宋代,书

院掌教的称“山长”或“洞主”，有的是传一个学派学术的大师，有的是地方礼聘的有声望的学者，都不受官府节制。到元代，官府则有意把“山长”作为学官，使之受官府任用和管辖。不过元代书院，多数也还是属于民间的，一些人元不仕的大师，隐居授徒，最为这时书院的特色。明代初，不重视书院，后由于王守仁、湛若水重振讲学之风，书院方大为发达。可是这时期的书院，多为官办。王、湛本人就是达官，门生也多显贵。王门弟子徐阶（华亭），继严嵩为宰相，曾竭力提倡办书院，开讲会，于是下面的官吏都以办书院来逢迎他。《野获编》说：“嘉靖末年，徐华亭以首揆为主盟，一时趋骛者，人人自托我道，凡抚台蒞镇，必立书院，以鸠集生徒，冀当路见知。”这些书院虽然不是官学，却是官办的，与乡里之学毕竟不同。清代最初压制书院，后来又大办书院，并使之官学化。一方面颁匾额、赐书籍、给膏火、定保举；一方面对院长的聘请，经费的稽覈，讲习的情况乃至考课的审阅，官府都要过问。而且大多数书院废除讲学，专考帖括，和官立的学校没有什么两样。乾嘉以后，朴学大兴，一些大书院注重经史诗赋，还出现像阮元所办的“诂经精舍”一类的新书院，在课士的内容上确是一个刷新。但主持者是在职的封疆大吏，他们所以能这样办，很多地方都表现出是由于有官府的力量。从上面的分析看来，说书院是私学，又有点讲不过去，但推究书院兴起的原由，历代书院的建立和恢复，大多靠民间力量；而且自创始到罢废，书院一直没有列入国家学校系统。从这方面来说，“书院是私学”仍不失为书院的一个特色。

书院传习理学 自汉武帝罢百家，置五经博士以后，传习

儒经便成为太学的主要任务。由于通儒经可以做官，开闢了利禄之途，读书人便钻在儒经里。经学大师(包括私学)多到千余人，汉代经学，可谓盛极一时。汉代传习儒经，注重解释经文，有时一两个字的解释，可以达到三万字，因之称为“训诂之学”或“考据之学”，也就是后世所谓的“汉学”。到了宋代，出现了另一种局面。开这个局面的始于程颐、程颢，成于朱熹。他们遍注诸经，朱熹更抬高《四书》的地位，写了一部极有影响的《四书集注》。程朱反对汉儒专在字句上作训诂，标榜要研求儒经的“微言大意”。所谓探求微言大意，就是说要对自己对儒经的体会来说出它的精奥。因此，可以离开经文注经，甚至可以删补章句(如朱熹补大学格物致知传)，称为“义理之学”，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宋学”。宋代研究儒经的人很多，北宋的王安石，南宋的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吕祖谦等都是有名的，不过他们不属于宋学。一般称“宋学”是专指“理学”一派，包括明代的理学在内。汉代经学和宋明理学都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汉代经学以董仲舒春秋公羊学为最有势力，它用“天人感应”说来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地位。魏晋以后这种人格化的天帝，已渐渐不为人们所信。于是有王弼用“以无为本”的玄学哲理注《易》的事。唐代佛学大盛，大乘各宗，讲本体，讲认识，讲“觉”讲“悟”，还讲了很多属于哲学范畴的问题，如心与尘(即物)、理与事、一与多、生与灭等。讲得既玄妙，而一套修持方法，特别是禅宗的心性修养，更能麻痹劳动人民，因此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护持，儒学相形见绌。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对抗释老，使儒学重新获得地位，不能不创一种新儒学——理学。这种新儒学，用属于哲学概念的“理”

来代替人格化的天帝，并竭力抬高理的地位，说成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或规律。实际上“理”或“天理”就是纲常之道，于是纲常之道便无可逃于天地之间了。同时还另闢一条为汉儒所无而佛学所大讲的修养心性的道路，教人内向用力做“存天理、灭人欲”的工夫，来发挥纲常之道的作用，使劳动人民心甘情愿接受统治而不反抗。理学由二程开创，到南宋分立门户，朱熹一支主张“理”是超绝的、独立存在的实体，是先天地而生而又派生万事万物的，这就是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另一支是陆九渊，他主张“心即理”，理在心中，这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理学。朱陆分立门户，只是入门的方法不同。朱熹主张“道问学”，由格物致知而上通天理，先做读书的下学工夫；陆九渊主张“尊德性”，要求直指心性，先立其大者，反对搞支离破碎的传注工作。至于扶植纲常的目的，则是一致的，所争只在用那一种办法能更有效地达到目的。朱学由于南宋理宗的表扬^①，成为官方哲学。元代主要是朱学的势力。明代王守仁、湛若水是陆学的拥护者，明正德以后大盛，而王学传播尤广。所以讲到理学，从人物说是程、朱、陆、王之学；从时代说，往往宋明并提，称宋明理学，清中叶以后，理学由盛而衰。

理学酝酿于北宋，书院也始建于北宋；理学到南宋而大盛，书院也盛于南宋。明初理学无生气，书院也不振，到了王守仁、湛若水到处讲理学，书院也随之大为发展。刘伯骥在《广东书院制度沿革》的绪论中说：“考宋、明理学所以特别发达，

① 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诏曰：“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辅治道……可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绍定二年(1229年)又改封徽国公。

一方面固然因它本身价值有扩大的可能性，而一方面还因为它有宣扬的凭借之所，足以养成风气。因此在清以前，书院之升降与理学之升降互为因果。”这就是书院传习理学的一种说法。文中说清以前，是因为清代在乾隆、嘉庆一段时间，大兴朴学，理学受到排斥，其实稍后一些时候，在几个著名的讲经古的书院里，理学还是有一定的地位的。“学海堂”道光十四年(1834年)规定诸生肄业的课程中，就有《朱子大全集》一种。广雅书院课程分为经、史、理、文四门，理即性理之学。综上所述，把传习理学作为书院的一个特点，也还是有根据的。

有人说，宋代以后，学校也学理学，因而不能说是书院的特色。这话有一部分是事实，但应当分析一下。我国自汉代以来，从太学到郡县学，都学习儒经。唐代科举考试，有明经科，考的也是儒经。这种儒经是孔颖达的《五经正义》，颜师古的《五经定本》，基本上沿袭汉代经学而不是宋学的经学。北宋有较长的一段时期盛行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三经新义》虽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经学，却不讲心性之学。程朱的道学，在宋代屡遭黜禁，^①到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才弛了伪学党禁。在此以前，朱熹虽竭力宣传他的理学体系，毕竟得不到官方支持。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衡文标准，是在元

① 高宗绍兴六年陈公辅请禁程氏之学。孝宗淳熙五年谢廓然乞戒有司以程颐、王安石之说取士。赵彥中复上疏说性理之学是以游言浮词相尚。孝宗十年陈贾请禁道学。郑丙上疏言：近臣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相用。孝宗十五年林栗请停罢朱熹。宁宗二年叶翥奏朱熹是伪学之魁，乞除毁语录之类。胡纘上言说伪学猖獗、图谋不轨。(可参阅《宋史纪事本末·道学崇黜》)

代仁宗以后。根据以上的分析，元初以前，理学并没有完全统制学校。不过明清两代的科举都沿用元制，明永乐年间又颁行了《性理大全》，理学确实成为学校和一部分书院所共同学习的课程。自元代起，书院已逐渐官学化，清代的府、州、县书院，几乎与学校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应科举考试的准备场所，学的相同，是不足奇怪的。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这些应科举考试的理学，只是理学的大路货。从理学的专精部分看，研习的只有书院，而学校是不在内的。南宋时学术繁荣，有讲心性之学的书院，也有讲事功之学的书院。即以讲心性之学的书院而论，陆九渊的书院就和朱熹的书院不同：一个发挥主观唯心主义理学的精微，一个讲述客观唯心主义理学的体系。朱熹的门徒很多，多立书院，传朱学。其中有谨守朱熹成说的，也有对朱学作进一步发挥的。像黄震、王应麟、何基、金履祥等人，有时所持的议论，竟与朱熹相牴牾。再说明代王守仁与湛若水都承陆学的统绪，但他们各有各的主张。王守仁的门徒也最多，各传王学，说法却不一样。王艮讲“百姓日用即道”，李材主止静，王畿一传再传至陶奭龄而走向狂禅，刘宗周救王学走向禅悟之病，立证人书院，主慎独，尚“意”而黜解悟。这些向专精方面发展的理学，学校里是不会讲习的。提“书院传习理学”，是指理学专精方面说的。以专精为界限，作为特点，还是讲得通的。不过我们还应当推究一下。就是说，如果讲这些具有专门学性质的书院，主要的或大多数传习理学，是可以的；如果讲这些具有专门学性质的书院全都传习理学则不可以。因为有些具有专门学性质的书院，恰恰不传习理学，或主要不传习理学，甚至是反对心性之学的。而这些书院在

中国书院史上又颇有地位，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也作过很大的贡献。如清代苏州的紫阳书院，扬州的梅花、安定书院，南京的钟山、惜阴书院，杭州的诂经精舍，广东的学海堂、菊坡、广雅书院，江阴的南菁书院等，它们主要讲习经史辞章，理学或不讲，或讲而不居重要地位。再如南宋的事功之学，包括陈亮的永康之学，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的永嘉之学，吕祖谦的婺学，也就是朱熹所痛恨的“浙学”，他们钻研经史，考订名物制度，尊重文献，主张实学实用，开物成务，又多长于文学，所持议论，还有不少朴素唯物主义观点，是一个重要的学派。由于程朱理学从南宋理宗以后成为正统儒学，后世称述这学派的人比较少，很是可惜。仔细考究一下，这个学派，流传久远是很有生命力的。由北山一派传至明初宋濂，一般说是朱学的传递，其实颇多浙学的成分。而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的清代浙东之学，也承接南宋浙学的绪余。

书院受禅林影响 提受禅林影响这一特色，一般是指书院的设置的地点和讲学方式仿效禅林说的。单就这两点说，已和学校大不相同，其实受禅林影响，还不只是如此。自魏以后，佛教信徒多依山林名胜之处，建立丛林，勤修禅道。书院初兴时，确是学着这个榜样的。像白鹿洞书院在庐山五老峰下，有林泉之胜；岳麓书院在岳麓山抱黄洞下，背陵向壑，木茂而泉洁；嵩阳书院在太室山南；石鼓书院在回雁峰下；茅山书院在三茅山中，都是依山林的。正如吕祖谦所说的：“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间旷以讲授。南宋一些新立的大书院，也还是如此。象山书院在象山，上有良田清池，蟠松怪石。朱熹的武夷

精舍、竹林精舍，都颇有风景，见于他自己写的诗篇。吕祖谦讲学在金华的明招山中。杜洲书院，规模不小，设在杜洲之滨。宋末季一些人元不仕的大师，更多隐居山中，设帐授徒。元代以后的书院，虽不尽这样，但有名的大书院还是力求设在名胜之地。湛若水在西樵、罗浮设立的书院、精舍，山环水绕都擅林泉之胜。王守仁讲学的稽山书院，也有山林可供徜徉。再如清代扬州梅花书院，在梅花岭下，除广植梅树外还有楼台池榭。苏州的“学古堂”，建在沧浪亭可园故址。“诂经精舍”设在杭州的西湖，“学海堂”选定粤秀山越王台旧址，面对珠江狮海，古林荫翳，交柯接叶。由此可见，书院是有选山林名胜之地作院址的这个特点，不过不是所有的书院都如此。

关于讲学的方式，禅林所行的有如下几种。（一）“讲经”，由禅师主讲，有一定仪式，听众极广。（二）“小参”与“晚参”，“参”有开示的意思。“小参”是指平时随便开讲，在夜间举行的就叫“晚参”，人数不多。（三）“普说”，是普通讨论的集会。（四）“朔望吃普茶”，是初一、十五举行的茶话会。（五）“入室请益”，是学者个人向长老问道。（参阅周予同：《中国学校制度》）其中（一）、（五）两项，为书院所采用，表现突出的是传习理学的书院，尤以传主观唯心主义理学的一派为最典型。陆九渊在象山建书堂为讲舍，又另建一方丈为自己居住之所。每日上午由方丈乘筭来书堂开讲，来时鸣鼓为号；讲时陞高座，弟子环绕座次听讲；讲毕回方丈，然后弟子往方丈问难。王守仁也是到处大开讲会，弟子环听。在稽山书院时，开讲前令童子歌诗，也是一种仪式。质疑问难的事也很多，“天泉桥证悟”

(王畿、钱德洪向王质疑)最为有名。采用禅林的一些讲学方式，不仅典型的传理学的书院是这样，有高明大师掌教的书院，一般也都是由大师一面开示生徒，一面接受个别生徒的请益。

此外还有一些受禅林影响的事。禅林设“长老”或“住持”司教务，书院称掌教的为“山长”、“洞主”，很明显是学禅林的。佛教徒记录禅师讲经的一些说法和交际问答的口语，称作“语录”，文字不加修饰，像说话一样。理学一派生徒，也学着这样做，为大师作语录。朱熹门徒所作的《朱子语类》，王守仁门徒所作的《传习录》，最有代表性。

受禅林影响最重要的所在，应该说是理学的内容。不少对理学持不同意见的人，常称理学是“援佛入儒”或“儒表佛里”，实际也是如此。佛教讲“戒”、“定”、“慧”。“戒”是持戒，守清规。怀海造《百丈清规》的禅律，说是给猿猴颈上拴铁索。理学家很有会心，制造一套纲常之道的枷锁拴在劳动人民的颈上。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教条》是清规，《童蒙须知》也是清规。“定”是入定、坐禅，把心静止下来，理学家崇尚静坐是从“定”来的。“慧”是要有一点知识，就是钻佛经。南朝佛教徒注佛经，其烦琐不下汉儒注儒经。朱熹主张道问学，教人先读经，是不排斥“慧”的。他提倡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便是所谓“定慧双修”。华严宗讲理(真如)事(万事万物)无碍，一即多、多即一。程朱理学高举天理，大讲“理一分殊”、“一一事中，理皆全备”，无疑是来自华严宗的。唐代禅宗大盛，既讲渐悟，又讲顿悟。陆王一派理学，崇尚“简易工夫”，受禅宗顿悟说的影响最大。朱熹辨陆学之非，竭力抨诋陆九渊，说“陆氏之学只